



(上接 8 月 25 日 A14 版)

丈夫蒋清平出事时，蒋妈妈正在老家的村里当民办教师。每天和一群百灵鸟一样的小学生在一起，她过的是快乐的日子。她很喜欢当老师，愿意把老师一直当下去。如果她再干两年，有可能从民办老师转为正式教师。但她没等到转成正式教师，丈夫一出事，她当正式教师的梦想就中断了。丈夫出事时，矿上给的抚恤金还比较低。好在当时有一项辅助性的抚恤政策是，矿工因工亡后，其适龄子女中可以有一个顶替工亡矿工参加工作，而且是国家正式工。这样一来，正在老家读高中的蒋妈妈的儿子蒋志方就终止了学业，顶替父亲到矿上当了一名工人。蒋妈妈已经失去了丈夫，万万不可再失去儿子，她必须和儿子在一起，天天陪伴儿子。她锁上老家的房门，在矿上买了两间房子，常年住到了矿上。矿上没有把儿子分配到井下，她儿子经过技术培训之后，到选煤楼上当了一名机电修理工。选煤楼在地面，在选煤楼里上一天班，虽然也是满手黑，满脸黑，但选煤楼里没有冒顶，没有透水，没有瓦斯爆炸，安全系数比井下大多了。蒋妈妈心里明白，这是矿上

在照顾她的儿子，也是在照顾她，她心里踏实多了。

为了接受那次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所造成的血的教训，矿上对安全教育抓得紧而又紧。这种教育自上而下分好多层次，矿上教育，队里教育，班组也在教育。教育除了有安全生产技能方面的传授，也是一种安全叮嘱。叮嘱无处不在，矿领导有叮嘱，队领导有叮嘱，班组长有叮嘱，工友之间有叮嘱，连家里的亲人也有叮嘱。矿工去下井，临出门妻子又叫住了他，说过来。妻子冲他呶着嘴，把红红的嘴唇呶成一枝“花蕾”。丈夫会意，回身在“花蕾”上亲了一下。“花蕾”随即开成了“花儿”，“花儿”的叮嘱是：好好去，好好回来，



那天矿上的一辆小汽车开进村时，她正给班里的学生上语文课。村长在教室门口招手让她出来，说矿上来人了，请她到矿上去。她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顿觉天旋地转，手脚冰凉。但她的意志还算坚强，说是要给学生布置一下作业，她又返回教室去了。她说同学们，我家里有点儿事，我回去一下。下半堂课，同学们把课文抄写一遍。先抄完的同学可以朗读课文，注意要用普通话朗读。说这番话时，她的喉头有些哽咽，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但她使劲忍着，没让眼泪流出来。出了教室，她的眼泪才夺眶而出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踏进过教室，再也没见过那些她的可爱的学生。说到这里，蒋妈妈的喉头又有些哽咽，眼睛也有些发湿。

坐在蒋妈妈旁边的韩部长，拿出一叠面巾纸，递给蒋妈妈，让蒋妈妈擦眼泪。

蒋妈妈接过面巾纸，没有往眼睛上擦，她低下头，擦了一下鼻子。擦过之后，她接着往下讲。她说丈夫活着时，她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对丈夫的安全有些担心。丈夫永远离去后，她才体会到了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生命都不是孤立的，与其他生命有着共生的关系。特别是和亲人之间，骨肉相连，血脉相连，心心相连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，谁都离不开谁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的生命既是属于自己的，也是

回来我给你好吃的。

矿上想把一些工亡矿工家属也动员起来，让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，讲一讲亲人离去后，对她们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，对她们精神所造成的痛苦，以及她们后来的生活所遇到的种种难处。这样现身说法，会讲出个性化的细节，感情色彩也浓一些，估计会对矿工的心灵形成比较有力的冲击，收到意想不到的安全教育效果。想法有了，可当他们找到那些工亡矿工家属，动员她们站出来讲一讲时，她们几乎都摇了摇头。

提起她们逝去的亲人，无一例外，她们眼里都含了泪，神情都很悲恸。让她们给大家讲一讲时，她们不是说自己嘴笨，

就是说自己害怕在人多的场合说话。想法是好想法，家属不愿配合也是白搭。其实他们也明白，人人长有一张嘴，用嘴吃饭是一回事，用嘴说话又是一回事。人人都会吃饭，不见得人人都会说话。说话与说话又有区别，说私话是一回事，说公话又是一回事；跟一个人说话是一回事，对很多人讲话又是一回事。有人在私下里说话，小嘴儿叭叭叭，快得跟转动的缝纫机一样，差不多能把别人的嘴缝住，只有她一个人在说话。但一让她到会场上说点公话，她的嘴像缝纫机坏了飞轮一样，立马儿哑巴。

韩部长是从省城分配到龙陌矿的女大学毕业生，当上女工部长后，她一心要在自己分管的工作中做出一番成绩。她不甘心让一个好的想法落空，就抱着再试试的念头，找到了蒋妈妈。提起丈夫蒋清平，蒋妈妈也流了泪，也表示了不愿再回首往事的意思。但耐不住韩部长态度恳切，差不多也流了泪，她说：蒋妈妈，我们年轻人在矿上开展点儿工作也不容易，您就当我是您的孩子，权当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吧。蒋妈妈犹豫了一会儿才说：那我就试试吧。

属于亲人的。由于各种各样的变故，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鲜活的生命突然消失。这种消失带有偶然性也带有强制性，割裂性，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。伤亡事故不但煤矿有，死于交通事故的人

更多，据说平均每两三秒钟就会死一个人。这种非正常死亡，当然会给死者带来痛苦，但更多的痛苦留给了生者，要由死者的亲人来承担。这种痛苦是大面积的，是深刻的，也是久远的。说它是大面积的，因为死者上有父母，中间有妻子和兄弟姐妹，下面可能还有孩子，死的是一个，牵涉到的是众多的亲人，还有亲戚。说它深刻，因为这种痛苦铭心刻骨，一痛再痛，很难消失。说它久远，这种痛苦有可能会世代代代流传下去，成为一种家族记忆。蒋妈妈把话题转回她自己，她说因为丈夫死于井下的冒顶事故，她对冒顶这个字眼特别敏感，也特别恐惧，一听有人说到冒顶，她心里就格登一下，好像遇到了灭顶之灾。同样的原因，她觉得顶板也多起来，屋顶是顶板，天顶也是顶板。不知不觉间，她进屋先看屋顶，出门先看天顶，仿佛屋顶和天顶也会冒顶，随时会塌下来。这样说着，她不由地看了一眼礼堂里的天花板，好像天花板也是一块顶板，也有可能冒落。见她仰脸看天花板，不少听众也随着她往上看，黑压压的听众里起了一点小小的不安。

蒋妈妈毕竟当过多年老师，她自我掌控得很好。说到伤心处，她的眼泪多次在眼里打转转，眼看就要掉下来。但她把眼泪控制在眼眶范围内，没让眼泪越过眼眶。她宁可以让眼泪流到肚子里，流到鼻腔里，也不愿让矿工和家属们跟着她伤心落泪。

她能控制自己，却不能控制听众的情绪，整个礼堂里一片眼泪，一片唏嘘。连韩部长都感动得不能自己，一次又一次用面巾纸擦眼泪，以致沾泪的纸巾在桌面上攒成一堆。

韩部长是这场现身说法报告会的主持人，在介绍蒋妈妈时，她好像没说蒋妈妈的名字，只说这是我们的蒋妈妈。也许韩部长提到了蒋妈妈的名字，但大家都没有记住，只记住了蒋妈妈。

那场报告会之后，全矿的人都知道矿上有个蒋妈妈，蒋妈妈成了大家的蒋妈妈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8 月 27 日 A14 版)

